

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的当代传承与创新研究

——以社火民俗为例

舒豪¹, 王茜²

1. 淮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淮安; 2. 铜仁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铜仁

摘要 | 社火是北方乡土社会的传统民俗文化形态, 融合祭祀仪式、民间表演与造型艺术, 承载着悠久的乡土集体记忆与广大民众的精神寄托。社火民俗文化的内涵与价值嬗变始终来源于社会生产方式与组织形态的变革过程。本研究以甘肃省灵台县 X 镇的社火活动为观照对象, 意图发掘社火民俗的当代文化价值、梳理发展现状并尝试优化传承与创新策略。当前社火习俗文化面临的传承主体断层、原生场景萎缩、文化本真性消解等结构性困境, 根源于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过程中民俗存在条件的根本性改变。实现社火的活态传承, 应在坚守文化内核的前提下, 从人才培育、空间重塑、价值构建三个维度推进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并建立文化本真性约束机制, 为民俗文化传播与创新创建路径、供给活力。

关键词 | 传统民俗文化; 社火民俗; 文化创新

Copyright © 2026 by the author(s).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1 引言

在新时代大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宏观战略背景下, 乡土民俗作为基层文化载体, 迎来了保护与发展的双重机遇。社火广泛流传于晋、陕、甘等北方乡村, 依托元宵、春节开展巡游表演, 多地列入非遗名录。然而, 在城镇化快速推进、人口大规模流动、数字媒介深度渗透的社会转型期, 社火民俗正遭遇传承主体持续

萎缩、原生表演场景加速消解、过度商业化侵蚀文化内核等现实困境。此类困境并非社火独有, 而是当代中国乡土民俗面临的共性问题。

我国学界对民俗文化的研究成果颇丰, 诸多学者从不同学科和不同视角对民俗文化这一源于地域地理水文、发展于社会历史进程、作用于现代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与社会精神生活的文化现象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有的学者认为, 以历史叙事的研究范式, 从物料、器具等可以被观照和加以溯源的民俗文物入手来建构民俗文化的本体论, 并通过对相关民具、民艺的研究来揭示民俗文化的价值内涵, 这

作者简介: 舒豪, 淮安大学讲师, 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应用伦理学方向研究; 王茜, 铜仁学院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向研究。

文章引用: 舒豪, 王茜. 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的当代传承与创新研究——以社火民俗为例[J]. 澄启学刊, 2026, 1 (3): 102-108.
<https://doi.org/10.68070/cacgp008>

一理论强调通过可视化的质料研究来理解和诠释民俗文化^[1]；有学者指出，要系统性地研究民俗文化，应当完善民俗学的元理论，强调以“生活—叙事”范式来对民俗文化进行整合性质的研究^[2]；还有学者从文化遗产的角度出发，强调对待民俗文化的方式要从原先静态保存向动态交互和活态传承转变，将文化传承引向社会生产和百姓生活^[3]。毫无疑问，这些已有的民俗文化研究视角、研究内容和研究路径为社火民俗文化研究提供了丰裕的借鉴材料，然而，无论是基于理论本位的元理论研究还是基于现实本位的物料或现象研究，皆未能脱离二元对立结构的研究范式。社火民俗文化作为我国北方地区重要的祈愿文化，需要以科学的自然观与生态观予以客观审视，以现实的人文关怀和历史情怀赋予蓬勃生机。基于此，本研究试图厘清和尝试解决以下几个核心问题。第一，社火民俗如何在现代社会突出和传承其文化价值；第二，现代化背景下城乡空间的格局变化如何影响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第三，社火民俗如何与现代数智技术融合产生新的传播形态和地域文化样态。笔者分别于 2024 年与 2025 年前往甘肃陇中地区，实地探访社火筹备情况，对部分社火队员和当地居民进行访谈，详细了解社火民俗活动的举办频率、传播形式与传播功效、相关文化产业发展情况等内容。笔者在老家甘肃省灵台县 X 镇，与在本地社火活动中担任舞戏工作的数位艺人以及若干本镇居民进行深入接触。通过交流，笔者初步了解了社火民俗近年来在 X 镇的演出路线变化、参与人员的年龄结构变化，以及社火民俗作为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与数智媒体相结合之后的传播路径变化与自媒体人的收益情况，综合分析影响民俗文化传播与发展的各项因素及作用机制。

2 社火民俗的文化内涵与当代价值

作为我国传统社会地区性风俗文化的社火在当代社会有所传承和发展创新，首先需要回答其“是什么”与“何以是”的问题。社火并非静止不变的文化形式，其具体形态经历了漫长的演变，每一阶段都与特定生产方式与社会结构深度关联。应溯源社火民俗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揭示生产方式变革和社会历史变迁如何塑造其存在形式，赋予其文化内涵，继而评估和定位其当代价值。

2.1 社火民俗的文化内涵

“社火”源于传统时期我国北方地区的祈愿活动，祈愿是传统社会里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文化仪式领域的投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祈愿通常以举行祭祀活动向神灵祷告为主要形式，其“源于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巫术崇拜、祖先崇拜以及对支配现实世界的各种无形力量的敬畏而引发的泛神

灵崇拜。”^[4]^[149]社火民俗便是我国传统社会祈愿活动的一种。“社火”一词源于上古土地祭祀，狭义的“社”指“祭祀土地神”，意指直接向掌管“土地”这一最普遍生产资料的神祇进行祭祀，而广义的“社”则是对山河湖泊等大地之上的所有神灵进行祭祀，站在古代统治阶级的角度也有“祭祀社稷”的内涵；“火”指“火神”，也意指消弭蛮荒，为人们带来文明重构的自然之力，有驱邪祈福之义。

在精神信仰层面，传统社会中的乡土文化通常倾向于以火、土、血等元素搭作为向神灵祭祀的基础质料，而在以陇中为代表地域的关中地区，当地民众以“耍秧歌”“敲锣鼓”“跳傩舞”为主要祭祀内容，通过巡游表演的形式传递祈求丰收、平安的朴素诉求，这是在我国文化中民众与神灵建立联系、传达祈愿的主要方式，这同样也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对自然、图腾、祖先等有灵之存在的基本态度，即感恩施予、敬而畏之。

在社会联结层面，社火作为向神灵祈祷风调雨顺、丰收安康的民俗形式，在古代以当地士绅为主要组织者，乡民为主要承担者，向当地官府报备之后方可进行祭祀活动。因此，作为一种祈愿祭祀活动，社火既面向“圣—俗”关系，也面向“人—人”关系。社火的物资与人员筹备、表演的形式与流程依靠全村通力合作，这种民俗活动以细致的仪式分工和共同的社会意识建构强化了宗族邻里关系，巩固了乡土中国“熟人社会”的基本关系网络，稳定了社会基层的治理秩序，体现了民俗文化的社会治理与整合的重要价值，因此，社火不仅发挥了在民众心中与神通灵的祈愿功能，也充当了当地官绅、民众之间的“粘合剂”，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基层治理者与群众之间在生产生活维度的复杂社会关系。

在民间艺术层面，社火民俗是一座流动的艺术宝库。传统民俗文化之艺术价值在于用非理性的形象、声音和形态等形式来言说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有机关联，呈现蕴含于文化表象下的深层精神内核。社火民俗作为我国民间文化的代表之一，整合了面具彩绘、高跷、锣鼓、秧歌、傩舞等艺术形式，最大程度地保留了西北地区原生态的民间文化形态，社火祭祀活动的表演美学，是乡村内部伦理观念与精神认同的感性表现。^[5]传统民俗文化在社会功能层面的现代转向，恰恰指向了其源于中华传统民俗文化并应运而生的“文化遗产价值”和“审美价值”，这些皆构成了社火民俗文化在民间艺术层面的文化内涵，即“文化源于生活并不断重塑生活”的互构关系。

2.2 社火民俗的当代传承价值

一是发挥我国地域传统文化“活态精神档案”的文化记忆功能。作为一种传统的周期性祭祀活动，社火民俗长期在我国西北乡村区域流传并承担着乡

村共同体的“粘合剂”功能，这种功能的发挥倚赖于民俗对乡村共同体全民的潜在规约性。作为一种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为求农业风调雨顺而由民众自发组织的春祈秋报，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和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民俗文化也受到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具体表现为以地缘与血缘为基础的地域性祭祀仪式的外在规约性有所减弱。但“一定地域的、民族的、社会的民俗传承，总是受一定地域、民族、社会的人们共同心理因素支配的”^{[6]37}，这也意味着支撑社火民俗传承的社会意识基础并没有消失，并随着区域的经济文化发展而衍生出全新的时代价值，即站在国家文化战略的层面树立以民俗文化为重要内容的文化自信，繁荣区域文化、促进区域产业发展。

二是为社会凝聚力与文化向心力的增强提供载体功能。传统文化在当今社会重新焕发生机，一方面是因为华夏文明的连贯性使得传统文化在今天仍然保留着民众熟悉的符号和形式，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得传统文化得以以新的表现形式和新的时代内容融入到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延续和深化民众对传统文化的认同。现代社会中农业发展仍然需要遵循基本的自然规律，因此，社火的春祈秋报不仅是当地民众在千百年的历史中留存下来的风俗习惯，更是人与自然浑然一体、和谐发展的智慧体现。另一方面，作为一种相沿成习的民俗，社火仪式中锣鼓喧天、傩舞高跷、千灯万盏代表了民众对风调雨顺的渴望与幸福生活的祈盼，承载着民众对小家庭与大家国的炽热情感。在与居民A的交谈中得知，灵台县的社火活动几乎覆盖包括X镇在内的所有地区，当地已将这一活动打造成春节文旅的热门IP，不仅招揽了大量外地游客前往，还串联了本地的中医药、腊肉销售等特色产业，形成了文旅商贸融合的增收大盘。由此可见，以社火祭祀的方式聚拢乡民观礼过节，打造独家文旅特色，既丰富了基层的公共文化生活，也拉动了区域经济发展，凝聚了乡土民众的文化自信，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建设供给了充沛动力。

三是为现代美育提供多元的文化元素。社火之所以在现今互联网上能够广为传播并为大量非西北地域民众所熟知，离不开社火祭祀活动对人独特的感官冲击与审美体验。无论是陇西部分地区观之骇人的“血社火”，亦或是陇中地区车社火与芯子社火，都展现了当地流传已久的风俗惯习，蕴含着悠久的历史记忆与文化情感，其中，民众在社火活动中的歌舞“伞头秧歌”“小秧歌”、技法“高跷”“芯子”、拟态“舞龙”“舞狮”“竹马”“傩舞”等表演所呈现出的西北地区质朴热烈的民间造型、色彩体系，为现代美术、文创设计提供了传统文化创作素材，丰富了大众的民间美育内容。

3 社火民俗传承的结构性困境

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实体传承特征的文化形式，社火民俗同样面临与其他地区民俗文化遗产相似的结构性困境。传承主体的断层、存在场景的压缩与表现形式转型的阻滞，共同构成了社火民俗文化遗产的困境。

3.1 传承主体断层，传承人培养后继无力

社火作为一种需要以村落作为共同体组织举办的民俗祭祀活动，本身高度依赖于共同体内各参与主体的协同配合，譬如活动的组织者在当地被称为“头家”，“头家”又根据分工职能的不同具体分为“大头家”与“小头家”，前者负责活动的具体策划与流程规制，后者则负责对外联络与社员整合，整场活动从策划者到参与者都需要自发和自觉地认同并参与这场合同，而非迫于外在的法规律令，这也就意味着社火祭祀活动能够坚持周期性地举行，主要依靠乡村共同体中成员对祭祀祈愿这一民俗行为的信仰认同与行为惯性，而这种认同感与惯性在今天面临着消解的风险。首先，当前社火行业核心传承群体呈现出明显的老龄化特征。社火祭祀活动能否顺利举办，不仅在于有无熟悉傩戏歌舞、铜锣乐器、舞灯技法和社火器具雕刻制作的资深匠人和表演者，还在于有无足量的愿意将该技艺和民俗惯习传承下去的年轻人，老一辈社火队员的精力衰退、系统性的语言能力较弱也使得对技艺的口传心授效果欠佳，而系统文字、影像资料的缺乏也令相当部分的社火表演手艺乏人接续，从而面临永久失传的风险。在与舞戏队员B交流时得知，本地参与“高跷”“舞龙”“舞狮”等特色民俗活动的青年队员数量稀少，已经连续数年得不到年轻队员的补充，整个舞戏队伍老龄化程度不断加剧，其他更具习得难度的器具制作等手工工艺更是缺少传承人，传统工艺后继有阻。其次，城镇化的持续推进从城乡空间格局和城乡观念维度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乡土居民的文化意识。大量乡村青年外出求学、异地务工，逐渐融入网格化的城市生活，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转变、长期脱离乡土民俗环境，让原先的乡村青年的乡土认识浅薄、乡土情结淡漠，地域空间的分离与乡土文化认同度的削弱，使得这些青年拜师学艺、参与社火表演的意愿也逐渐低迷。最后，习俗文化传承的机制不健全。综合来看，常态化的民俗传习场所与制度化的培养机制目前尚比较欠缺，“传承人—校园—青年社群”的一体化链条尚未建立，新生代力量供给不足，传承队伍持续萎缩。上述三重因素叠加，其深层根源均可追溯至生产方式变革对民俗存在条件的根本性改写——当农耕不再是主要生计方式，依附于农耕生活的民俗技艺便失去了自然延续的经济基础。

3.2 传统乡土生存场景持续消解

社火的完整仪式与集体巡游高度依赖特定的村落格局、宗族组织与农耕生活节律。生产方式的历史变革,从物理空间与社会组织两个维度改变了社火民俗文化的存续条件。

一是城乡格局的流变,挤压乡土居民的民俗祭祀仪式的空间。农耕文明是社火民俗诞生的历史土壤,农耕文明对外在自然条件的需求和华夏民族对神灵的天然敬畏使得社火民俗有着产生和发展的机缘。在中国历史上,社火民俗有着完整的祭祀仪式,祭祀仪式的组织者会根据当地村落的地理格局与农耕生产规律与生活节奏来组织集体巡游活动。以甘肃陇中的社火民俗为例,社火祭祀活动以大量村民参与的“热闹”氛围为表象,本质上则需要以有组织、有秩序的祭祀活动建立起人与神圣世界的“圣-俗关联”,“在社火的‘热闹’与神的‘欢喜’间建立连接的是陇中人对神圣世界的信仰观念,即人的生活秩序之‘规范/失范’与天神‘欢喜/不喜’之意志的对应关系,这种观念超越了‘感应’的逻辑,将人的世俗生活秩序与天神的神圣世界相关联。”^{[7][179]}然而,现代社会的发展重塑了我国整体的城乡格局,并对广大农村地区进行了基础设施的普遍改造,有着宏伟自然风光但农业资源相对薄弱的陇中地区接受了旧房拆迁、村民安置、水电网络等生活设施的接入,大范围、深层次地改变了原有乡村的地形格局和建筑特征,曾经的固定巡游街巷以及用于祭祀的戏台与祠堂大量消失,从空间上限制了社火民俗的仪式规模。

二是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使得社火民俗逐渐失去了传统时期寄愿于外力的文化内涵,大量民众不再持有以祈愿为生产生活信仰依靠的精神需求。一方面,在社火民俗流行的乡村地区,以农业人口为主的居民结构随着城镇化的进程加快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居民收入的多样化使得乡村民众不再集中倚赖于单纯的农业生产,这也大幅弱化了当地民众组织和进行社火仪式的现实需求,社火仪式从一种全域性、全民性的民俗活动逐渐降级为偏表演性质、以文化遗产为主要需求的群体活动。另一方面,随着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乡村民众日益减少,各级教育在乡村地区的普及以及科学知识的广泛传播不断重塑城乡居民对自然与人的关系认知,对神灵的需求无论是从现实祈愿层面还是精神寄托层面都不断趋弱。生存与生产需求的依托对象转移促使生存与生产场景趋于重构,工业现代化进程对农业产生深远影响,现代化农业让仍旧以农业为主业的乡村居民能够更加独立地完成完整的农业生产过程,并在空间上与其他居民产生一定程度的隔绝,传统农业中居民间通过生产互助而产生的亲密地缘关系的肢

解让乡村“熟人社会”的建立根基动摇,人口居住分散、传统宗族联结淡化,传统的乡村生活共同体正在逐渐瓦解,“随着生活共同体的衰落,人们共享的生活情境越来越少”^{[8][58]}当生活情境中的一般性变为特殊性,共同的文化记忆便会逐渐淡漠,这也是民俗文化遗产和创新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

3.3 现代化转型背景下的文化传播阻滞

一是传统传播模式存在明显滞后性。社火作为周期性民俗文化活动,每年仅在春节、元宵节等时间节点,在线下短期展演,演出地域也基本局限于我国西北地区和东北部分地区,且主要集中于乡镇,对城市空间文化传播的影响极为有限。受时间、地域的双重束缚,传播方式主要依赖线上平台,通过短视频和抖音直播等新媒体渠道传播,“西北农村地区”和“传统民俗文化”的标签又难以吸引城市居民和青年人群,导致流量获取迟滞,无法在传播领域形成规模效应。二是文旅开发同质化、过度商业化特征明显。部分地区为迎合国内旅游市场和文化消费市场,往往以流量为导向,随意更改社火仪式的重要元素,删减仪式活动中的“鼓乐”“傩舞”等形式,并采用工业化流水线作业方式批量生产廉价的社火文创,挤压了传统手工社火器具制作匠人生存空间,也剥离了社火在传统器具制作维度的文化价值,具有悠久历史的乡土民俗沦为完全盈利导向的商业演出,民俗文化元素被现代商品社会需求异化,民俗原生本身的内核也不断遭遇消解。三是传统艺术表达与当代大众审美脱节。传统社火表演存在节奏拖沓、故事叙事晦涩老旧等问题,部分地区社火如陕西关中的“血社火”更是以利器入脑、鲜血四溅的骇人场面作为风俗特色,极易为非本地区原住民的观赏者产生负向的审美体验。血社火表演在形式、演员与群众等方面所表现出的狂欢化特征固然表现出宣泄性和大众性等积极能量,但传统文化中基于“血崇拜”而产生的“血祭”形式留存至今,本身便带有一定的宗教色彩。过度的视觉冲击在带来短期热度的同时,同样缺乏吸引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年群体注意力的鲜明特色。

4 社火民俗文化遗产与创新优化

社火民俗的传承创新,首先需在方法论层面厘清“守正”与“创新”的辩证关系。“守正”,即守住社火的文化内核。“创新”,即使社火获得与当代社会相适配的存在形态。社火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创新,需要以健全青年人才培养体系、重建民俗生存空间和建构分层开发与文化约束机制为切入点,系统性解决民俗文化遗产与创新过程中的主体问题、场域问题与机制问题。

4.1 健全青年人才培育体系, 破解传承主体断层难题

社会民俗传承关键在于传承主体, 传承主体有意愿、有条件、有能力, 才能使社火民俗传承拥有扎实的主体基础。针对老一辈传人高龄化、新乡村青年参与意愿低迷等问题, 应当首先从民俗文化传播人的培养机制建构出发, 搭建校园、社群、非遗传承人三位一体长效育人链。一方面, 根据当地具体情况, 有计划、有秩序、有侧重地推进社火民俗文化进校园, 让中小学生能够近距离地感受社火民俗文化, 同时辅以专题讲座、课余实践活动、民俗文化校本课程的方式, 让学生群体建立对民俗文化的基础认知; 高校艺术、民俗文化相关专业则可以邀请民间传承人进校授课, 也可以牵头与社火民俗文化相关研究机构和民间文化社团结成文化产业发展合作关系, 为系统研究和常态普及筑牢现实基础, 同时组织学生下乡实地参观与参与社火祭祀活动的筹备与实践, 全阶段构建青少年的乡土文化认知。另一方面, 扶持返乡青年、在校大学生成立民俗创新社群, 在完整保留祭祀内核的基础上优化表演形式, 在保留文化特质和风情的基础上简化民俗表演中的冗长桥段、丰富配乐音效, 打造适配城市舞台、社区展演的轻量化剧目, 降低以青年群体为主的城乡居民参与门槛, 建成从校园到乡村的技艺创新——市场拓展——民俗文化重建的全链条。同时, 推出非遗配套扶持政策, 完善非遗保护和传承发展制度, 提升资深的民俗文化传播人的生活补助, 通过发展文旅产业带动民俗文化的对外传播, 以“文化—商业”同构同进的运营模式激励传统技艺的师徒传承工作, 以官方组织、市场反馈、民众自愿的原则开展常态化技艺集训, 持续补充新生代传承力量, 缓解民俗文化遗产传承的人才断层危机。^[9]

4.2 场景重塑: 线下空间修复与数字空间拓展

面对原生场景消解的困境, “线下修复”与“数字建构”需双线并行, 重塑社火的生存空间。

首先, 线下层面修复与再造民俗空间。维护传统村落中具有文化标识意义的巡游街巷、祭祀场地, 坚持春节、元宵期间村民自发的公益性社火展演, 完整保留传统仪式流程, 守住农耕民俗的生活底色。同时依托乡村振兴政策整合民宿、农事采摘等资源, 开发社火主题研学线路, 打造常态化的民俗体验场景。武乡县推出“顶灯主题研学路线”^[10], 串联传承场馆、表演场地与本土美食, 让游客从“观看者”转变为“参与者”, 这一做法为社火线下空间的拓展提供了参照。线下修复的关键不在于打造标准化的民俗展示场馆, 而在于激活村落自身的生活空间, 使社火重新嵌入村民的日常文化实践之中。其次, 线上层面建构永续的数字生存空间。数字化不是对

民俗的替代, 而是对其生存空间的拓展, “在民俗文化数字展览中, 移动可供性使展览突破时空阈限, 转化为一种伴随式的文化服务, 推动民俗文化从特定时空的仪式性观览转向去中心化、日常化的体验”^{[11]36}, 将民众对包括社火文化在内的民俗文化的了解过程建设为一种伴随式的、长效互动的数字体验。这种线下守住仪式的庄重性, 线上拓展传播的辐射面的互补共生的方式, 让社火民俗得以突破实体场地的限制, 在虚拟空间中延续生命。

4.3 机制建构: 分层开发与文化约束协同互促

作为民俗文化的典型代表之一, 社火祭祀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仍然具有宝贵的文化传承价值。化解民俗文化现代化转型矛盾的有效路径, 在于建立“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分层开发模式与刚性的文化保护约束机制。

首先, 推行分层文旅开发。区分公益原生展演与商业体验项目: 村落原生社火保持公益性, 不做商业化改造; 景区、非遗小镇设置面具手作、小型舞台演出等付费体验项目, 实现“商业不碰原生、收益反哺保护”的良性循环。各地应深入挖掘本地社火特色打造差异化 IP, 避免同质化的流水线开发。民俗文化源于历史源于生活, 是民俗生活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强调民俗生活共同体基因并不是否认各民族民俗生活的差异性, 而是在尊重各民族民俗生活实践差异中增进民俗的共性, 增强中华民族情感认同和文化认同”^{[12]61}, 并在此基础上凸显各民俗文化自身的鲜明特征, 陇东社火重脸谱谱系、晋南社火重锣鼓经、西宁社火重高台技艺, 各有侧重方能各美其美。其次, 优化数字传播与内容创新。以短视频、直播构建全媒体传播矩阵, 常态化更新匠人制作、巡游纪实、民俗科普内容, 节庆期间开展实时线上直播, 联动自媒体与美术创作者进行二次创作, 譬如晋南 X 村借助线上媒介重构社火组织模式, 将线下“新乡贤”组织动员与线上组织传播相结合, 有效提升了当地村民与线上群众的参与热情^[13]。最后, 建立文化本真性约束机制。出台地方社火保护条例, 明确核心仪式与传统脸谱纹样严禁随意篡改, 所有文旅、数字化改造项目须经民俗专家前置审核。“创造性转化”为形式的当代适配提供了合法性, “创新性发展”又防止了“为创新而创新”的盲目性, 二者共同构成文化本真性保护的制度框架。在坚守内核的前提下寻求表达的创新, 方能实现短期传播热度与长期活态传承的统一。

5 结论与展望

社火民俗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历悠久历史传承至今, 其扎根于中国乡土社会, 除了寄托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于风调雨顺、

生活安康的美好意愿之外,也彰显了中华文化“天人之际,合二为一”的人神观与宇宙观。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进中国城乡关系转型的关键历史节点,必须要大力弘扬包括社火在内的中国乡土民俗文化,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挖掘并发挥民俗文化对中国社会的文化整合与人心凝聚作用。应当看到,社火民俗的当代传承,本质上是传统乡土文化在现代社会条件中寻找新的存在方式与价值实现路径的历史性过程,社火民俗的出路不在于追寻和回归传统社会背景下的乡土文化,而在于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方法论指引,在内容和形式上加大创新力度,在彰显优秀传统文化当代价值的同时,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文化藩篱,以中华文化的多元性、包容性和创新性铸就全体中华儿女的文化自信。珍惜丰富多彩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对其进行积极的适配性改造,唯有如此,传统民俗这一承载着千年乡土记忆的文化形态,才能在新时代焕发出持久的生机与活力。

参考文献

- [1] 周星. 物质文化研究的格局与民具学在中国的成长[J]. 《民俗研究》, 2018(4): 31-50.
- [2] 李向振. 探索一种更具整合性的民俗学新范式——基于民俗学元理论的讨论[J].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2024(10): 110-118+157-158.
- [3] 黄仲山. 民俗的数字化生存与文化范式转型[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6, 43(4): 29-38.
- [4] 王廷信,周蓉. 狂欢与民间社火当代传承的动力机制[J]. 《云南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5): 149.
- [5] 王涛. “热闹”与乡土社会秩序的观念基础——陇中“社火”的民族志[J]. 《浙江学刊》, 2025(5): 176-187.
- [6] 陶立璠. 《民俗学概论》[M]. 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7: 37.
- [7] 王涛. “热闹”与乡土社会秩序的观念基础——陇中“社火”的民族志[J]. 《浙江学刊》, 2025(5): 179.
- [8] 俞炎燊,黄剑. 日常生活中的民俗与自我认同[J]. 《民俗研究》, 2025(1): 58.
- [9] 张海云. 乡村振兴背景下西北社火非遗的活态传承路径[J]. 《农村经济与科技》, 2024(4): 212-214.
- [10] 《山西武乡顶灯入选 2025 中国群众文化品牌创新案例》[N]. 《中国文化报》, 2025-12-17.
- [11] 邓秀军,苏日古嘎. 可供性视角下民俗文化的数字展览场景与跨文化认同构建[J]. 《出版广角》, 2026(5): 30-38.
- [12] 林继富. 包容性、共在感与凝聚力: 民俗生活共同体基因研究[J]. 《西北民族研究》, 2025(4): 61.
- [13] 李鹏,陈梓鑫. 毗邻而和:媒介传播与乡村社火筹演的再组织化研究——基于晋南 X 村的田野调查[J]. 《天府新论》, 2024(1): 112-122.

Contemporary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Folk Culture

— A Case Study of Shehuo Folk Customs

Shu Hao¹, Wang Xi²

1. School of Marxism, Huai'an university, Huaian ; 2. School of Marxism, Tongren university, Tongren

Abstract: Shehuo is a traditional folk cultural form in northern rural communities, integrating sacrificial rituals, folk performances, and visual arts, carrying profound collective rural memories and serving as a spiritual refuge for the masses. The evolution of Shehuo's cultural connotations and values has always stemmed from changes in social production methods an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This study takes Shehuo activities in X Town, Lingtai County, Gansu Province, as its case to explore the contemporary cultural value of Shehuo, examine its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 and propose strategies for optimizing its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The structural challenges currently facing Shehuo culture—such as a generational gap in inheritors, shrinking original performance contexts, and erosion of cultural authenticity—originate from fundamental shifts in the conditions supporting folk traditions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agrarian civilization to modern industrial society. To achieve dynamic preservation of Shehuo,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should be advanced through three dimensions: talent cultivation, spatial reconfiguration, and value construction, all while preserving the core cultural essence. Additionally, mechanisms to safeguard cultural authenticity must be established to provide pathways and vitality for the transmission and innovation of folk culture.

Keywords: Traditional folk culture; Shehuo folklore; Cultural innovation